



# 绍兴印山大墓的若干问题

## ——读《印山越王陵》札记



孙 华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摘 要** 浙江绍兴发现的印山大墓,是一座既有浓郁东南地区吴越文化的因素又有很多中原地区周文化因素的越王级墓葬。地上高大的封土堆、两面坡顶的无墙墓室、带把手的独木棺等因素是沿袭了越地本地的传统,其他如封土的形状、丘垄外环壕和神道的形式、墓室外积炭等,则带有浓烈的模仿中原周王陵的色彩,而不仅仅是中原秦国的文化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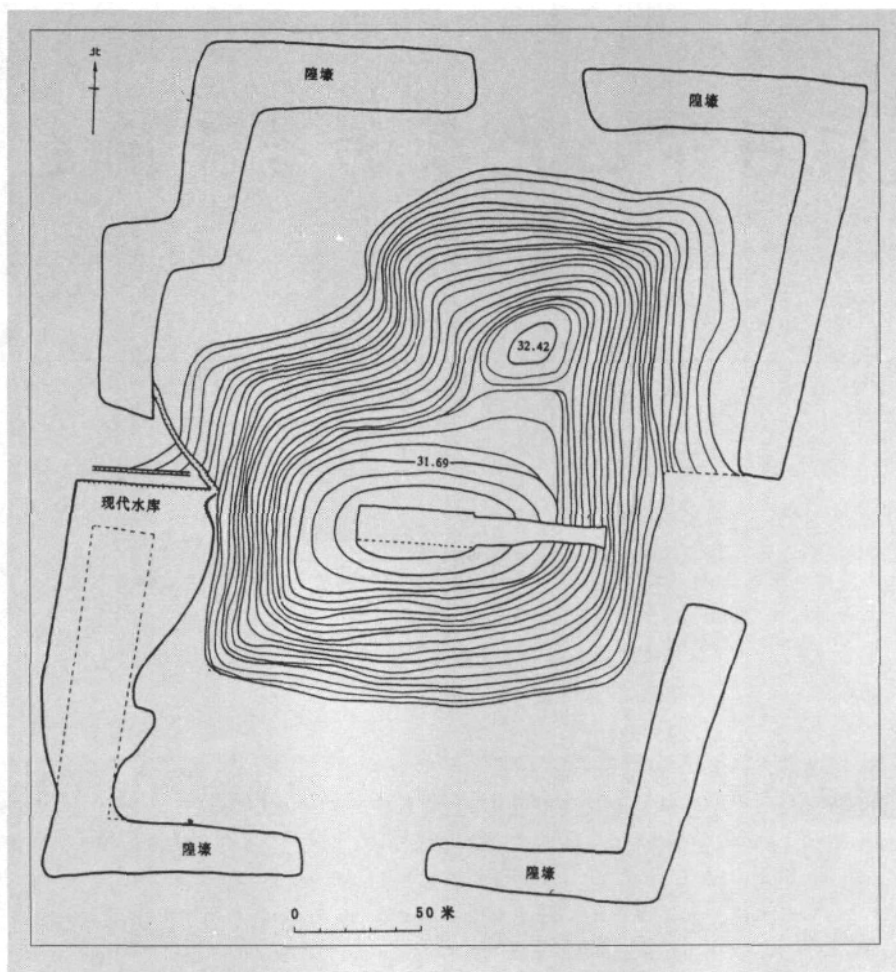
**关键词**: 周代王陵 越王陵 印山大墓

**Abstract** Yinshan Tomb, discovered in Shaoxing of Zhejiang Province, ranked to the tomb of Yue's King. The tomb contains different cultural factors of both strong Wu-Yue Cultures in southeast China and plentiful Zhou Culture in Central China. Some factors in Yinshan Tomb evolved the local traditions of Yue Area, just like the great earth-mound, the chamber without wall and with sloping ceiling, the coffin with handles made of just one whole wood. Other factors reflect the strong imitation to the mausoleums of Zhou Dynasty, not just to Qin's cultural factor in Central China, for example, the shape of earth-mound, the form of the ring trench and sacred way beside ridgehill, charcoal out of chamber, etc.

**Key words** Mausoleums of Zhou Dynasty, Mausoleum of Yue's King, Yinshan Tomb

浙江绍兴印山大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尤其是东南地区考古——的重要收获。尽管该墓在历史上和现当代都受到了严重的盗掘和破坏,但该墓宏大的规模、严谨的布局、独特的结构,还是给我们认识东南地区吴越文化的墓葬制度及其与中原诸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印山大墓的考古报告出版后,报告的主要作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陈元甫先生送给我一本,读后获益良多。报告在详细报道印山大墓考古材料的基础上,还对一系列学术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推断和解释。报告作者通过对墓葬规模、年代和后世文献关于越王墓位置的分析,指出印山大墓的墓主应当是春秋晚期越王允常之“木客

大墓”,通过对埋藏现象、文献记载和历史背景的分析,推断该墓并未发生过中途废弃和迁葬,但在秦统一后却遭到有意识的大规模的挖掘和破坏;通过该墓陵园四周隍壕与本地及中原周、秦、楚等国墓葬的对比,认为该墓制度除了墓上封土和包括独木棺在内墓室结构两个因素是越文化固有传统因素外,其余主要是受到了当时中原地区的秦公陵园制度的影响等等<sup>①</sup>。这些推断和解释,大都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唯有该墓陵园制度受到秦国影响等推断,似乎证据不足。此外,关于该墓的墓室结构、葬具形态和出土器物反映的问题,报告还没有进行过进一步的讨论。因此,笔者写这篇短文,就印山大墓的上述问题



图一 印山大墓基地平面图

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就教于陈元甫诸先生。

### 一、仿效周人高级贵族墓地的隍壕

印山大墓位于群山环抱的一条狭窄的喇叭状平川上,地势西南略高而东北稍低,西南狭窄而东北宽敞。大墓因为要保持大致的正东西向,不能将前面的墓道朝向敞开的东北方,但总的形势还是可以理解为背负山丘,面向宽敞的平川,地理形势相当不错。

大墓的地表有规模宏大的墓园建筑,保存至今的除了高大的封土外,最引人注意的还有围绕在封土周围的壕沟和跨越壕沟四出的神道(图一)。

东南地区大型土墩墓多位于山岗上,不利于开凿围墓沟(也可能有考古调查发掘的工作视野和范围方面的问题,有的围墓沟可能没有发现),故在这些大型土墩墓周围都罕见有围墓沟发现的报道<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俯瞰印山大墓可以清晰辨识的规整的围墓沟,自然就会引起研究者极大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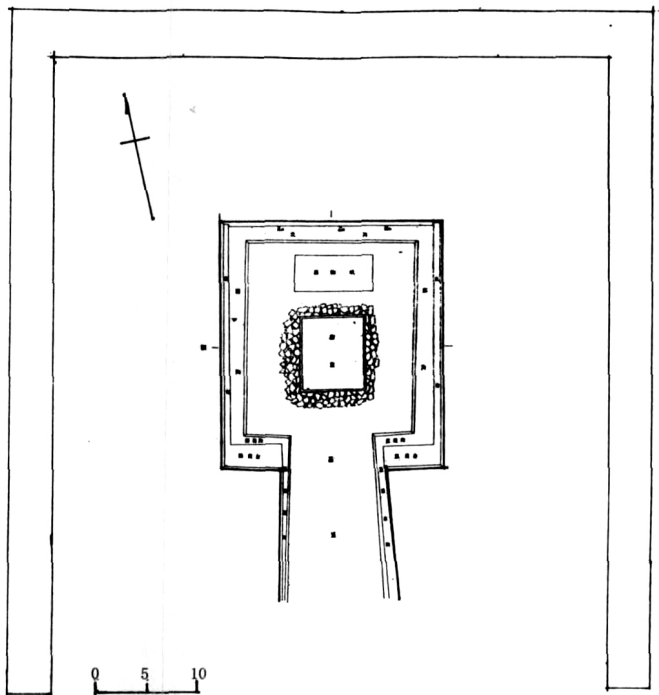
印山大墓周围有近似方形的宽阔的沟壕,这种非自然形态的壕沟当然是人工挖掘的陵园防护体系,可起到标识陵园范围和分隔陵园内外的作用。墓葬或墓地周围挖掘沟壕作为墓葬或墓地的界限,这应当是本自生人居住的城邑周围城垣和沟渰。在血缘纽带在社会结构中还起相当大作用的先秦时期,居住在城内的人们通常是以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一个或多个群体。为了防范外敌的侵袭和保障城邑内部的秩序,这些城邑周围一般要修筑城墙和挖掘壕沟,同时城邑内的权贵阶层为了自身安全和凸现身份的需要,也要使用城墙和沟濠围绕在自己的宅第四周。这些生前居住在城邑中的人们死后,统治者及其家族要在自己的墓葬周围使用象征城郭沟渰的墓园围墙或围墓沟,按照族坟墓制度埋葬在一起的具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其他贵族和平民也会在他们的公共墓地周围挖掘沟渰以象征地下的城郭。墓地和

墓葬周围的地上围墙如西周时期的陕西岐山县周公庙周公陵墓区、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江苏句容县东边山1号墓<sup>③</sup>、战国时期的湖北枣阳市九联墩楚墓<sup>④</sup>等,这里不需提及,仅就围墓沟来说,无论在文献记载中还是在考古遗存中,都反映出这是中原墓地制度的普遍传统<sup>⑤</sup>,不仅秦国如此。

墓地周围有壕沟,这是周王朝墓葬制度的通例。《周礼·春官·冢人》说:“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周礼·春官·墓大夫》也说:“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贾公彦疏:“墓域,即上文兆域是也,为四畔沟兆。”沟兆即沟洫,《说文》:“洫,畔也。”也就是说,无论是“公墓”还是“邦墓”,墓地四周都有壕沟作为边界。这种墓地周围以壕沟为界的现象,在文献中还明见于最恪守周礼的鲁国公族墓地。《左传》定公元年记鲁国执政季孙氏驱逐鲁昭公,昭公客死于晋国后,鲁人迎葬昭公,“季孙使役如阌,公氏将沟焉。荣驾鹄曰:‘生不能事,死又离之,以自旌也。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杜预注:“阌,鲁群公墓所在也。季孙恶昭公,欲沟绝其兆域,不使与先君同。”<sup>⑥</sup>杨伯俊注:“沟者,于昭公之墓外为沟,扩大墓域,表示昭公墓与鲁群公墓同一兆域。”<sup>⑦</sup>周代以后,周人的这套墓地制度在西汉时期高级贵族的陵墓上还在沿用,如墓葬用土坑和多重棺槨,墓葬平面按等级分为十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和口字形等,其墓地或墓葬范围的界限应当也与周人墓地有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汉代大型墓葬和墓地也应当有墙垣和沟渎的存在。《汉书·王莽传》记王莽始建国五年,“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与元帝合而沟绝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从考古实例来看,在周代中原文化系统的诸侯国中,秦国确实是最流行在墓地和墓葬周围修建围墓沟的国家。修建围墓沟的例子最早出现在春秋中期,在陕西凤翔县南指挥村的秦都雍城时期的秦公墓园中,几乎所有的秦公墓园都有围墓沟的设施,有的还不止一圈——既有环绕一座秦公墓或秦公夫人墓的围墓沟,也有环绕一组秦公及其夫人墓的更大的围墓沟,还有环绕整个秦公墓园的围墓沟壕<sup>⑧</sup>。到了战国后期的陕西临潼县秦王陵园中,却未发现围绕坟墓的沟壕,代之而起的是多重陵园的墙垣。然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战国后期的普通秦人墓地却有不少采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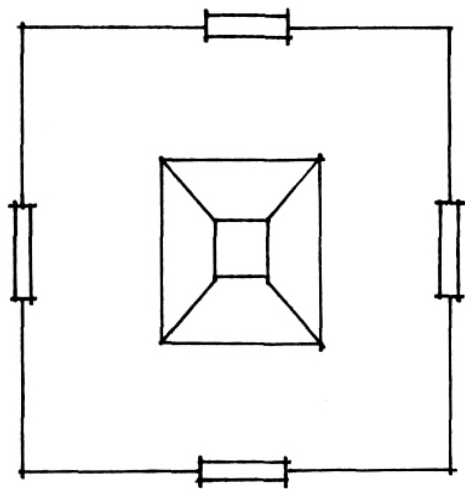
先前在只有很高级秦公墓地才使用的围墓沟,这些使用围墓沟的普通秦人墓主要发现于秦国后来征服的土地上,如山西侯马市乔村墓地<sup>⑨</sup>、曲沃县曲村墓地<sup>⑩</sup>、河南三门峡市火电厂墓地<sup>⑪</sup>等。秦国墓地围墓沟的这种变化是战国中期开始的秦国深刻的社会变化的反映,其具体内涵还需要作专门的探讨,我们这里不打算涉及。不过,在东周时期周王朝的诸侯大国中,秦国是保留西周时期周王朝文化传统最多的国家,例如其青铜礼器顽强仿效西周后期的组合形式和器物造型,其文字在与东方六国迥然不同而与西周文字一脉相承,其国君墓葬尽管规模极其巨大但墓室的平面形态却全然按照周礼的诸侯规制等等。因此,秦国墓地采用围墓沟的现象较多很可能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周人固有的制度和习俗,并不是秦国的特色。只是由于中原列国的大型墓葬的墓地很少像秦国两处国君墓地那样全面进行钻探和揭露等原因,这些墓地即使有围墓沟恐怕也很难发现。据笔者所知,在目前发掘的东周时期东方六国的墓葬中,有围墓沟的只有春秋晚期的山东临淄区齐故城M5一座<sup>⑫</sup>。该墓为前面带一条墓道的全长60米的甲字形大墓,该墓的墓室底部的周边挖有沟渠,在墓室的周围还有宽度还不到两米的平面呈“门”字形围墓沟,沟内埋有大量的马。其围墓沟的形制与秦国雍城秦公墓地的内陵壕相似(图二)。



图二 山东临淄区齐故城M5平面



印山大墓四面的围墓壕沟的中央都没有挖通,形成了四个宽阔的入口。这种前、后、左、右四个入口也就是四门的做法,不同于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厝墓出土“兆域图”所示中山王厝陵园只有前面一个门的规划<sup>[3]</sup>,而是类似于后来的陕西临潼县秦始皇陵园<sup>[4]</sup>和汉代皇家陵园如汉宣帝的杜陵的前后左右四个门的情况(图三)<sup>[5]</sup>。中原秦汉皇家陵园四



图三 汉宣帝杜陵园平面图

门四神道对应的是地下墓室的四墓道,这也就是古代文献所说“天子有隧”之“隧”(即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使用四出墓道)<sup>[6]</sup>。按照汉代帝陵制度,帝陵的墓穴“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sup>[7]</sup>墓穴为四出墓道,其陵园自然也是四门四道。《史记·李将军列传》:“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墙地。”《索隐》案:“墙地,神道之地也。《黄图》云:‘阳陵阙门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广四十三丈也。’”汉代的墓葬制度是从秦代沿袭而来,秦代的墓葬制度又是从周代墓葬制度而来,但秦国国君在称王以前,秦国只是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其国君墓穴只能够采用比周王低一级的前后两条羨道的中字形,而不能采用四条羨道的十字形。秦都雍城时期秦国国君的陵墓,都是东西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葬。两条墓道墓葬的陵园,其神道自然只能是两条,故其陵园的隍壕也都是东西壕或南北壕各有一段未挖通,形成对称的二门(凤翔秦公陵园的隍壕设施比较复杂,有围绕整个陵园的外壕,围绕包括一代秦公及其君夫人陵墓的中隍,以及只围绕一座秦公陵墓的内隍三种。内隍因秦墓为东西向的缘故,其门道也多为东西向,但因周制开南北门的缘故,有的内隍也开了南北门,从而形成四个门道的内隍。中隍一般在南北壕各留一门道,

只有个别陵园只探出了南门道或北门道,原先恐怕也是南北二门<sup>[8]</sup>)。秦国墓葬制度采用的周制中的第二等的侯伯之制,越国自号为王,它效法中原的制度当然应当效法中原周王朝的最高等级制度才是。因此,与其说是印山越王大墓的四出神道和隍壕采用了秦制,还不如说是采用周制更为妥当。

## 二. 取法南北的墓葬封护形态

印山大墓的墓上有高大的封土坟丘,封土平面呈曲尺形,墓室没有位于封土下的正中,而是偏在右侧,这不大符合常理,应当有特别的原因。根据钻探的结果可知,印山大墓封土东北边向东突出的小土丘,除了汉代以后的土坑墓和砖室墓外,“并无先秦时期的墓葬存在,这里不可能存在印山王陵的陪葬墓”(原报告第67页)。不过,没有发现先秦墓葬不等于当时陵墓规划时就没有预留有打算今后异穴合葬的墓葬。还是以中原地区诸侯国墓葬为例,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厝墓出土的错金《兆域图》铜板,其内容是中山王厝墓陵园的规划图,按照该规划图,中山王错与他的两位王后和两位夫人的墓葬修建在一座倒凸字形的夯土台基下,王墓居中布置,尺度最大;两个王后的墓位在王墓的两侧,尺度略小;两位夫人的墓位又在两位夫人墓的侧后,尺度最小。如果只看中间的王堂和左侧的王后堂、夫人堂的台基,其形状就如同一个曲尺形。因此,印山大墓封土的这种奇怪的形态,有可能是在墓地规划时为埋葬后死的墓主的亲属有意预留的。可能是由于当时越地的墓位观念,这个为后来预留的墓位土丘并没有与主墓整齐并列,而是略向前(即向东)突出一些。与之相适应的是,印山大墓坟丘周围的围墓隍壕也随着这个预留土丘的前凸而向前凸进,从而使隍壕的平面形态由方形(或长方形)变为曲尺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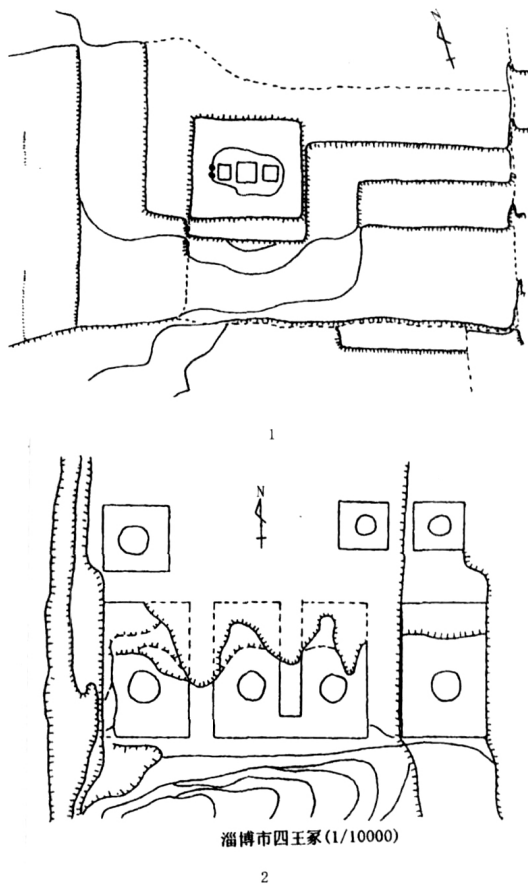
中国东南地区,尤其是浙江省,是土墩墓产生最早,延续时间也最长的墓葬形式。根据目前有学者对土墩墓的研究成果,土墩墓早在夏代就已出现在浙江省南部,西周以后逐渐传布于整个东南地区,尤其是在浙江、江苏南部和安徽南部<sup>[9]</sup>。典型的土墩墓有多种不同的墓位形态,就每个土墩的墓葬数量及其处理方式来说,除了一墩一墓居中埋葬的方式外,还有一墩多墓同层埋葬、一墩多墓分层埋葬的形式。印山大墓属于最大型的土墩墓,在最初规划时预备在茕域里构筑两座坟墓,以后因故只构筑了一座,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如果印山大墓在规划时有两座墓的封土墩台,排除掉东北侧的那座后来没有营建墓葬的小丘,实

际上有墓室的这座大墓的封土墩平面是呈纵长方形,这应当是东南地区土一墩一墓类型土墩墓封土的基本形态。大型土墩墓的墓穴呈狭条状的长方形,墓穴上的封土当然也随之堆成纵长方形的土台(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东周时期各国各地区的不同文化圈的墓葬封土中,东南地区“后湖熟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土墩墓有许多平面为纵长方形,这在那些封土带多道石围墙加固的土墩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可能是受到了东南地区土墩墓的影响,长江以北淮河流域的徐文化在春秋中期以后,江汉地区的楚文化在战国早期以后,其大型墓葬也采用了类似土墩墓的高大封土<sup>①</sup>。不过封土的形状却是近似正方形的土台。中原其他国家墓葬上流行封土的年代已在战国早期以后<sup>②</sup>,但封土的形状却如同当时中原的大型宫室建筑一样,被建成横长方形的土台,如山西新绛县柳泉村墓地的M301、302、303是同在一座横长方形台状封土下(后一座墓上的封土已经在修公路等取土活动中被破坏)<sup>③</sup>;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的封土系在一座横长方形的夯土台基上修筑一大两小三座方形的殿堂<sup>④</sup>;山东临淄区的“田和塚”、“二王塚”、“三郎墓”、“四王塚”都是在横向夯土台基上加筑一至三座方台形的封土(图四)<sup>⑤</sup>。河北平山中山王厝墓所出《兆域图》是在横向的凸字形封土台基上修建中间三座大而两侧两座小的五座方形的殿堂<sup>⑥</sup>。这种封土平面形状的差异不能说没有原因的,它们与不同地区地面宫室建筑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首先看中原地区。中原生人使用的地面宫室建筑通常建筑在横长方形的夯土台基上,主体建筑的规模的增大主要采用增加横向的开间来实现(这可以大大降低建筑技术的难度),当时人们在宫室建筑群中的公共活动是以主体建筑前的庭院为中心来展开的。受这种生人地面建筑的影响,再受到南方地区墓葬封土的启发,中原地区早期大型墓葬的封土修筑成类似宫室建筑夯土基址的横长方形,这就是顺理成章的。

然后我们看东南地区。东南的气候炎热潮湿,地面建筑一般不筑夯土台基,其建筑类型主要是架空在地表上的木构干栏式房屋、以地表为室内地面的木骨泥墙的房屋和两面坡无墙的房屋。从考古材料来看,在长江中下游的史前时期的房屋可能与后来岭南地区的一样,其屋顶呈脊长檐短的形状,如江西清江县营盘里出土的一件陶器的盖钮,其屋顶就作正脊长而前后檐短的两坡房屋造型,脊檩向两山远



图四 中原地区战国墓封土举例

1. 辉县固围村大墓封土 2. 山东临淄区“四王冢”

远伸出且略上昂<sup>⑦</sup>。这些南方地区的原始建筑,从民族志的材料来看,其平面形态有相当大的比例都采用的是将山墙的一面朝着前面开门的纵长方形。如果要在死者居住的纵长方形的房屋(墓室即椁室)上覆盖封土的话,其封土的平面形态当然也应当是纵长方形的有棱有角的方台状。

从上面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建筑台基和墓葬封土的平面形态来看,印山大墓的坟丘显然是东南地区建筑传统和土墩墓墓葬传统的产物。

我们知道,土墩墓通常没有墓穴,耸起的土墩往往就是墓室的载体。像印山大墓这样的大型土墩墓往往有稍微深一点的墓穴,只是墓穴仍然呈窄长条形,且墓穴的深度仍然不能与非土墩墓相比。小型土墩墓的墓室无需墓道,但大型墓则需要挖掘进入墓室的墓道。由于墓穴浅且多在平地堆筑的土墩上挖穴,墓底道与墓室底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而不像中原地区的带墓道的土坑墓那样,墓道底部是由浅

及深的斜坡墓道。至于印山大墓的方向,如果以从墓道所在的朝向为准,该墓的方向就是座西朝东,也就是朝向墓葬所在山沟的沟口方向。这既有可能是由于越人的丧葬方位观念决定的,也可能是由于地理环境决定的。越人属于东方古族,东周时期中原列国的族源有可能属于来自东方的古国,如秦、赵等国的公族墓葬的墓道方向就是朝东,越王族是否有这种墓葬的方位观念,还需要检视更多的资料才能得出结论。

印山大墓的坟丘封土是本地墓葬传统的产物,不过,在印山大墓的墓葬封护结构中,不仅存在着沿用东南传统的封土形态,也存在着效法中原周文化系统墓葬的椁室积炭。印山大墓的墓室(椁室)周围包裹着厚达一米左右的木炭,这在越地的墓葬中是几乎不见的,不是当地的埋葬习俗。原报告已经注意到这种包裹木炭的墓葬习俗在楚文化墓葬中几乎不见,并根据陕西凤翔县雍城春秋时期的秦公大墓普遍在墓穴内填泥用炭的现象,推断印山大墓的积炭习俗与墼壕做法一样都来自秦国而不是来自楚地和中原地区<sup>②</sup>。这种认识也是存在偏差的。我们知道,从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开始,周文化的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礼仪体系已经形成并基本取代了先前从商文化那里沿袭下来的礼仪体系。在墓室构建方面,周人除了逐渐完善多重棺椁制度、新建了饰棺制度外,在椁室外侧包裹木炭以防潮,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吕氏春秋·孟冬纪·节葬》记载当时流行的厚葬习俗说:“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题凑之室,棺椁数积,积石积炭,以环其外。”从考古材料来看,积炭之俗与周人墓葬制度的许多因素一样,都出现在西周中期偏晚阶段,陕西长安县张家坡井叔墓地是包括了四代井叔墓的贵族墓地,其中 M157 组最早, M152、168 组次之, M170 组最晚,其年代跨度为西周中期前后。在年代稍早的 M157、152、168 诸墓中,都没有积炭的做法,而在年代最晚的 M179 中,墓底已经铺设了一层木炭(但椁室周围尚无木炭)<sup>③</sup>。山西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的年代在西周早期和中期偏早阶段的诸晋侯及其夫人墓葬(M9、13、114、113、6)的椁室四周及上下都未铺垫木炭,西周中期后段的晋侯及其夫人墓葬(M7、33、32)已经在椁底铺垫有一层木炭了,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的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M91、92、1、2、8、31、64、62、63、93)在椁室周围都包裹有厚厚的木炭<sup>④</sup>。到了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大型墓葬积炭已经是很常见的现象,如春秋早中期前后的山西闻喜县上郭村晋国墓地中较大的墓葬也都积

炭<sup>⑤</sup>。春秋时期秦国国君陵墓积炭一方面可能沿袭自关中地区周人贵族墓葬积炭的习俗,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到了东周时期周王朝中心地区诸侯国贵族墓葬积炭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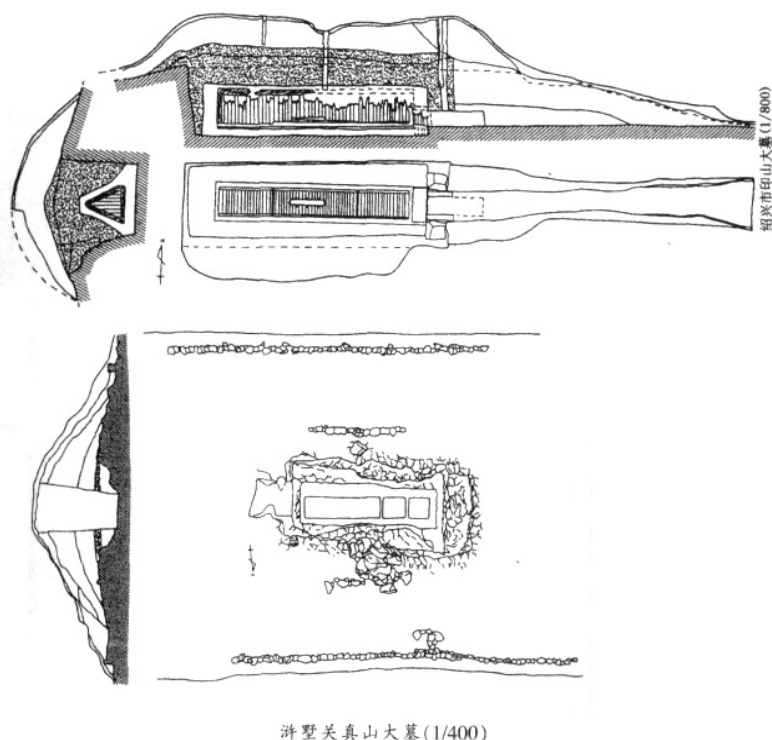
从周文化圈的诸侯国大型墓葬结构来看,秦国是较晚在墓室中使用木炭保护木制葬具的国家。已经发掘的年代较早的秦国大型墓葬,基本上都未见使用木炭的现象,如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的两座中字形秦公一级的大墓,其墓主尽管有多种说法,但不出秦庄公、襄公、文公、宁公四公的范围(公元前 878~前 704 年),这两座秦公大墓都没有采东方诸国早已经流行的积炭做法<sup>⑥</sup>。目前所知的采用积炭的大型秦国墓葬,是陕西凤翔县秦都雍城时期的 1 号秦公墓,该墓墓主可能是春秋晚期的秦景公(公元前 573 年),估计秦国大型墓开始积炭的年代不会早过春秋中期。在春秋中晚期,江淮地区的大型墓葬已经出现了积炭的大型墓葬,如河南固始县侯古堆大墓,是春秋末期宋国或吴国的甲字形墓葬,该墓的椁室就包裹着厚厚的木炭。楚文化墓葬积炭现象出现较晚,在河南淅川县下寺墓地是春秋晚期前后的楚国高级贵族的葬地,但该墓地中的墓葬都没有采用积炭的做法。楚文化中较早的积炭大墓是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其墓主是楚国附属国的国君,年代为战国早期<sup>⑦</sup>。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晋及三晋两周的大型墓葬中,自西周中期以来都流行墓葬积炭的做法,如晋国除了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的后期墓葬外,年代大致与之衔接的闻喜县上郭村墓地中较大的墓葬(春秋早中期前后)也都积炭<sup>⑧</sup>。秦国高级贵族墓葬椁外积炭,应当是受到周、晋等正统周人贵族葬制的影响。

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与中原周王室和北方地区的霸主晋国都保持着较多的联系,晋国的统治者出于遏制楚国的需要还曾有意培植吴国的势力,吴越两国出于北上争霸的需要在文化上都努力模仿周文化的东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越国统治者的仿效对象必然是周王室和与周王室关系最密切的晋、郑、鲁诸国,不应当仿效距离较远且被东方诸国看不起的西方秦国,这是显而易见的。

### 三. 沿袭本地传统的墓室葬具

如果说印山大墓的封护形态既有东南地区的传统因素又有模仿中原周文化的因素的话,那么该墓的地下建筑则主要体现了东南地区越人自身的建筑传统。这些地下的丧葬设施,包括了木构的两面坡形墓室(椁室)、整木挖斫的独木棺,不是做给其他国





图五 印山大墓木构墓室形制图

家人们观看的礼仪，而是基于越国本地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习俗的传统的积淀。

印山大墓墓穴的平面形态为前方带一条长长的墓道的狭长的“凸”字形，墓穴为狭窄的纵长方形，而与之同时和在其前后的中原的大型墓葬，其墓穴都是呈宽长方形甚至近似正方形，二者平面形态明显不同。从立面上看，印山大墓的墓道坡度极其平缓，坡度仅5~6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条平墓道，这与中原地区大型墓葬的倾斜度很大的斜坡墓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sup>④</sup>。印山大墓的墓穴底面虽然比墓道底面低1.6米，但在墓穴铺垫了木炭层后，墓道就与墓穴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当墓穴内构筑了木构墓室后，墓室底部的枋木铺就的地板高度甚至高于了墓道后端的高度<sup>⑤</sup>，这也与中原地区大型墓葬墓穴及墓室低于墓道的状况有所不同（图五）。印山大墓与中原列国大型墓葬在墓穴构造上存在的这些差异，有的是与东南地区土墩墓平地起坟或平地浅坑做法相通，如大体水平的墓道以及墓道与墓穴基本都在同一平面上的做法，这在墓室形态清楚的土墩石室墓中更比比皆是<sup>⑥</sup>。甚至一些规模较大墓葬，其墓室也经常修建成窄长条形，墓底枕木铺设形式也与印山大墓颇为相似，江苏苏州市真山大墓即其一例<sup>⑦</sup>。可

以断定，印山大墓这些不同于中原列国的墓穴形态应当是包括越王族在内的东南地区相当数量的一个人群的自身埋葬习俗。

印山大墓的墓室（椁室）形制特别，墓室两侧没有木枋叠垒的直立墙壁，由紧密排列木枋拼成的两面坡的屋顶直接架在铺地木板上，再在屋面上覆盖多层树皮防止雨水渗透，使得墓室如同地面上的人字形桁架的长屋。这种长屋脱胎于原始的三角形棚架，建筑学家将这种由密集排列的椽桷构成的两面坡屋顶叫做“天根地元造”<sup>⑧</sup>。原始的“天根地元造”是交叉排列的竹子和小树作为椽子，其上覆盖茅草、树叶或树皮。这种房屋容易建造，也容易根据功能的变化无限制地加长，在中国上古

的南方地区应当是有相当数量的，近代中国南方已经很少见了，但在东南亚半岛和太平洋的岛屿上却还可以见到。如美拉尼西亚的班克斯（Banks）群岛的男子公所“加米尔”（Camel），就是一种平面呈窄长方形的地面长屋，长屋无墙，“双斜面的屋顶，茅草一直覆盖到地面，比一般房屋大得多，有长达90多米者”<sup>⑨</sup>。印山大墓的时代已经超越了使用原始无墙两面坡长屋的时代，作为越国的最高统治者或高级贵族，他们生前居住在华丽的宫室中，不大可能还生活在无墙无窗的两面坡长屋内。浙江绍兴市坡塘306号墓出土的纹乐铜屋模型，铜屋平面呈长方形，下部有凸起的台基，屋身面阔和进深均为三间，前面开敞，仅保留两根檐柱，两山壁面为格子落地窗，后壁辟小窗一扇，檐柱上和墙上架设四角攒尖的屋顶<sup>⑩</sup>。该铜屋模型不是当时宫室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只是伎乐们为贵族们演奏音乐的场所。这样的房屋都被修建成中国传统建筑的样式，可以想见，那些观看演奏的王室成员们的朝寝建筑，一定是下有崇厚的台基、中有带柱子和墙壁的屋身、上有类似于中原地区宫室建筑的四阿顶或悬山顶的华丽壮观的殿堂。既然越地高级贵族生前应当居住在接受比较讲究的带台基和墙壁的房屋建筑内，为什么他们死后要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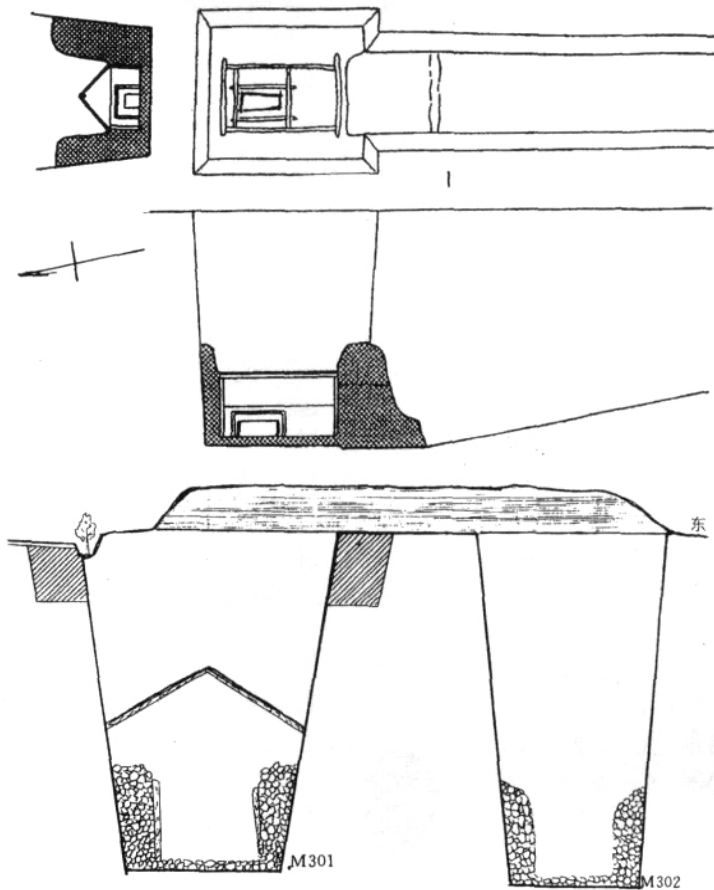
放置在这种相对原始的没有墙壁的长屋类建筑中呢？这就不能不从墓葬葬俗的保守性方面去寻找原因。

墓葬椁室是安顿死者棺柩的设施，它是在墓地构筑为死者居住的房屋。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土坑墓，在墓穴内仿照房屋用木材修筑椁室，因为墓内的木椁外面被填土包裹，椁外表现居室的立面毫无用处，只有作为死者居住空间的椁内能够做点文章。中原贵族居住的宫室有四面的墙壁和两面坡或四面坡的屋顶，其内部有天花遮挡屋顶的梁架，作为死者止息椁室的内部空间以四周叠垒的木枋表示墙壁，以平铺的木枋表示天花板（当然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支撑和阻隔其上填土的盖板），故中原地区常见的木椁都是简单的平顶。不过，即便如此，中原地区仍然有少数墓葬在墓中仿效地面宫室做出了两面坡形的屋顶，如山西新绛县柳泉村墓地的M301，该墓墓穴内“距椁之上约2米筑有木构‘人’字形屋架，塌陷后仅在南北两壁留有人字形木痕。

⑪”河南洛阳市西郊M4是一座战国中期的平面呈甲字形的大墓，该墓的椁室在覆盖盖板后，南北两头继续垒砌木枋和圆木，逐渐收缩成三角形的山墙模样，然后在两山顶端放置一根圆木为脊檩，其上左右相对铺设圆木为椽和木板为屋面，从而使椁室呈现两面坡的屋子形状⑫。战国后期至西汉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人字形两面坡顶的空心砖墓，可能就是从先秦时期中原地区这种两面坡椁顶的木构椁室发展而来（图六）。

在墓穴内用木枋搭建没有墙体的两面坡人字顶木椁室的做法，并不是印山大墓的特例，而是中国东南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墓葬形式。根据最新的考古材料，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江苏宁常、镇栗高速公路沿线发掘了土墩墓40座，其中多座土墩发现有这种两面坡人字顶的椁室。这种椁室都是土墩中心的墓葬，椁室“由基槽、两面坡的木棚、石床等部分组成，有的还有通往墓外的道路，在棚子之上再堆土成丘”。发掘者林留根等先生指出，“这类木棚

建筑与浙江印山越王墓的形制较为类似，实际上可能就是截面呈三角形的两面坡椁室。⑬”江苏宁镇地区是吴国故地，这里在西周以前本无土墩墓的传统，土墩墓是西周时期从越国故地浙江地区传来的墓葬形式，西周以后吴地的主体人群本来来自越地，其葬俗也应从越地带来，故春秋末吴国的伍子胥谏吴王夫差说：“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与我亦然。”⑭”春秋战国之际的印山大墓的两坡无墙的木棚型椁室与更早的江苏宁镇地区土墩墓相同，并不是受到了北面吴地的影响，而是越地自身传统的延续，只是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目前在浙江一带还没有发现年代更早的两坡无墙的木棚型椁室而已。这种两面坡无墙的木棚型椁室不仅见于吴越地区，在更南的南越地区的大型墓葬中都可以见到。广东广州市猫耳岗南越国高级贵族墓的椁室就是尚保存了这种墓室形式的典型例子。猫耳岗大墓的墓穴平面呈较宽的



图六 中原地区的屋形墓室结构

上. 山西新绛县柳泉村301号墓 下. 河南洛阳市西郊4号墓



“凸”字形，木构墓室即椁室的平面也呈较宽的“凸”字形。墓室由墓道、甬道和主室组成，甬道就如同普通木椁墓较小的前室，底部铺木枋，两侧叠垒木枋为墙，墙上铺木枋为顶，构成标准的直壁平顶木椁室，后室则在底部横铺较长的木枋为底板，其上两侧墙的位置只有两根粗大的地梁，地梁上斜铺12对木枋为顶板，顶板的上半部虽然已经朽烂无存，但该椁室为无墙或只有矮墙（如果地梁可以算作墙的话）的两坡人字顶墓室，这是可以肯定的<sup>⑤</sup>。该墓的墓主原简报推测为“南越王室成员一级的墓葬”，按南越国是从中原南下的秦将赵佗所建，南越国王族所采用的葬俗也应当是与中原相同的周汉之制，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那样<sup>⑥</sup>。采用无墙两面坡形木椁的大墓葬俗的应当是当地越人贵族（当然这些越人贵族可能与南越国王室有通婚关系）。由此可见，两坡人字形木椁的墓葬在东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应当延续时间很长、分布范围很广的古越人的葬具形式。这种葬具的来源，则可追溯到越地更早流行的“天根地元造”的居住房屋。

在印山大墓的人字坡墓室的中室内，放置着一具独木棺。这种棺是用一截整根圆木，将其四面砍削平整，两头各留下一个或两个凸出的把手，再从上至下挖凿出棺室的特殊葬具。这种棺在东南地区的越人墓中屡见不鲜，如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其陪葬棺是两端留有一个抬把的原木挖凿的独木棺，主棺外棺为木枋垒砌、下有双枕木为抬梁的样式，内棺也是内部凿空的独木棺，只是两端未留抬把<sup>⑦</sup>。这种带抬把的独木棺也应当是古越人的葬具形式，华南地区后来的崖洞葬木棺大多都带抬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sup>⑧</sup>。

#### 四. 劫余文物的几个问题

印山大墓遭到多次盗掘，遗留物已经不多，但劫余之物中仍然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物，应当加以注意。

首先应当提出讨论的是在该墓墓坑的填土中出土的一件完整的铜铎。

这件铜铎体量尽管不大，却保存十分完整，就连木制的铎舌和铎柄都保存了下来，非常可贵。铜铎与在该墓墓坑和墓道中出土的木夯杵、铜凿等不同，它不是可以直接用于修建墓葬工作的工具，与铜凿、木夯杵和藤竹编织的筐子等工人使用的工具有别，它的制作也相对精美，与粗笨的木夯杵不可同日而语，不应当是可以随意抛弃之物。因此，这件铜铎不是一般的随葬品，它很可能是负责组织和监督修建印山

大墓的官员使用的器具，用摇晃振动铜铎发出的声响来指挥修建陵墓的工程人员的劳作。

摇晃振动铜铎、铜铃一类响器来进行指挥，这在古代的行军作战和田猎活动常见，《周礼·夏官·大司马》：“群司马振铎，车徒皆作”这就如同近现代还有的在一些集体的劳动或其他活动中，组织者还用摇铃、敲钟、打锣等形式来指挥行为的起始、休息和结束的时间。甚至在一些劳动进行的过程中，也还可以利用这种铜乐器来调节劳动的节奏，就如同在插秧和薅秧过程中打秧歌锣鼓之类。这件可以实用的铜乐器被抛置在墓室填土中，出土位置距离墓口仅1.5米（墓坑深度达12.4米），应当是该陵墓的主要营建工程即将完成时，因某种习俗或仪式的需要才被有意埋在墓坑中的。

铜铎和铜铃都是需要摇动才能使铃舌与铃身发生碰撞，从而振动发出声音。不过铃是口部朝下，铃舌是悬挂在铃身顶部的小环中，而铎是口部朝上，铎舌下端虽也是系于底部的小环内，但其上端确是依靠在铃身内壁上。铃需要悬挂在移动的物体上或被人持在手上摇晃才能发声，所以体量一般不大，铎体量较大，人手持摇晃困难，故要在其方釜内插一根较长的木柄，使用时木柄尾端立在地上，使用者手握住木柄上端前后或左右振动，依靠突然转向的惯性才能使铎舌与铎壁发生猛烈的碰撞。在文献记载中，描写铎的使用与钟鼓、鐃于一类从外部用槌敲打的打击乐器不同，《国语·吴语》记吴晋之战，吴王“乃秉桴，亲就鸣钟、鼓、丁宁、淳于，振铎，勇怯尽应。”在这里，其他几种有号令部众作用的乐器是用“桴”（槌）敲打发声，而铎却是靠摇晃振动发出声音。吴国和越国皆为东南地区的古国，尽管《史记》等文献称吴为周太王长子太伯之后，越为夏少康庶子之裔，但无论吴、越王室是否是中原古族的支系<sup>⑨</sup>，吴、越一带人们与中原诸国“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吴、越二国却是“接土邻境，壤交道属，习俗同，言语通”却是一个为当时人们共知的事实<sup>⑩</sup>。考古发现也表明，从西周开始，东南地区原来还存在的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的文化差别已经基本消失，后湖熟时代的东南地区即吴越地区已经构成统一的文化区。吴国使用铜铎作为号令部众的器具，越国也使用铜铎作为号令部众的器具，并且二者的使用方法也应当基本相同，都是在铜铎下安插一根较长的木柄，使用时手持木柄前后或左右振动。无独有偶，考古发现的两件带木柄的铜铎，除了越地印山大墓这件外，另一件就是在吴地出土的。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是一座具有吴越文化特

征的墓葬,墓的外棺用双抬架,内棺用独木棺,后者与印山大墓棺的情况相似。随葬的青铜器铎,下有方釜插接较长的木柄,内有双夹可以把木舌夹在其间,双夹间未见木舌痕迹,这不可能是朽烂了,因为铎的木柄仍然完好如初。随葬铜铎将木舌有意去掉,或者与鬼器不需要实际使用的观念有关<sup>⑤</sup>。

接着要讨论的是墓室中出土的玉镇。

在印山大墓劫余文物中,数量最大也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多达19枚的玉石的半球形器,报告将这种玉器称之为镇,这是很正确的。镇是放置在竹编或草编的坐席四角,镇压坐席使之平整,以防席角翘起有碍观瞻以及牵挂人衣裳的一种室内陈设。这种器具有玉、金、铜、瓷等多种质地,其中玉质的镇最为古人所重。《楚辞》“瑶席兮玉镇,盍将把乎群芳”(《九歌·东皇太一》);“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九歌·湘夫人》)等诗句,就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由于玉镇比较珍贵,数量也比其他质地的镇少,在文物中也很罕见。过去在南方地区出土了铜质和瓷质的镇多例,但就是没有出土过玉镇,印山大墓一下子就出土了这么多的玉镇,更显得该墓墓主身份的高贵。不过,压在坐席四角的镇应当是四个,即使只压坐席两个前面的席角也应当两个,原先玉镇的数量应当是双数而不是单数,印山大墓现存玉镇的数量应当少于原有的数量。从这些玉石镇出土的现象观察,除了出自盗洞的一件镇外,其余镇都出自中室两侧的撑檐枋(报告称“挡坎”)上或撑檐枋旁,可能已经被盗墓者移动了位置,但还有两件玉石镇仍然压在残存的席子上。估计原先的中室内整齐铺设有一定数量的坐席,席子的四角或两角都压有玉石镇。墓中这种铺设坐席的习俗可能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席地而坐的方式,浙江绍兴市坡塘306号墓出土的那件娱乐铜屋模型,奏乐者和歌唱者都是坐在地上,可以作为当时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注释<sup>⑥</sup>。

半球形的镇是古代最常见的镇形,这种镇有玉、铜、瓷等多种质料。半球形镇的上端都有带穿孔的钮,可以穿系绳索以方便提携,而古代的铃的上面也有半环钮,以便穿绳悬挂。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再加上东南地区有用青瓷来制作仿铜礼乐器的习惯,因而不乏学者都将青瓷的半球形镇当作乐器,称之为“铃”。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铃是需要有舌才能发声,铜铃都是有铃舌的,如果青瓷半球形器仿自铜铃的话,它也应当具备铃舌这个起码的构件才是。青瓷礼乐器都仿自青铜礼乐器,在青铜乐器中,成套的钟、镛、铎等才是主要打击乐器,铃并不是一套铜

乐器必需的组成部分,那些出土多件青瓷半球形器的墓葬中,已经有成套的青瓷编钟、编镛、勾鑃,也没有必要再制作青铜乐器中没有的成套的青瓷铃。到目前为止,我们无论在中原地区还是在东南地区的先秦遗存中,都没有发现过半球形的铜铃,已知的铜铃都是与钟、镛等形体相同的合瓦形,东南吴越地区这些半球形青瓷器物肯定也不会是铃,而应当与印山大墓的玉石印一样,都是镇压席子的青瓷镇。当然这些青瓷镇是铜、玉镇的仿制品还是当时日常使用的实用品,这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进一步的分析。

由印山大墓多达19件玉镇的情况,我们可以联想到另一座吴越大墓,也就是江苏无锡市鸿山丘承墩大墓出土的青瓷半球形器。该墓出土了大量这类瓷器,分大小两内,发掘报告和鸿山遗址博物馆的陈列说明都将这类器物当作仿铜的乐器“悬铃”,恐怕并不妥当。这些青瓷半球形器应当与印山大墓的玉镇一样,都是压席的镇,而不是演奏的铃。

综上所述,印山大墓除了地上高大的封土堆、木构墓室和棺木是沿袭了越地本地的传统外,其他如封土的形状、丘垄外环壕和神道的形式,都带有浓烈的模仿中原王陵的色彩,而不仅仅是中原秦国的文化因素。

注释: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② 黄晓芬博士曾经亲自调查越国故都浙江安吉县古城遗址周围的大型土墩墓,她注意到了八亩墩大墓周围的围墓沟。她这样描述说:“尤其是八亩墩,还环绕坟丘一周造设具有相当规模的方形环壕,至今,环壕还基本完好地保存在现地,且占环壕全面积大约一半以上的壕内还蓄满了水,其自然蓄水功能仍继续为当地的稻田耕作所利用。”(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第174~175页,岳麓书社,2003年。)

③ 李虎仁、田名利:《破解江南土墩墓迷雾》,《中华文化遗产》2005年第6期。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市九联墩楚墓》,《考古》2003年第7期。

⑤ 实际上,如果从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的人们都有在邑聚周围修筑围墙和壕沟的习惯来看,这些地区的人们给死去人们的葬地修筑围墙或挖掘壕沟,也完全都是可能的。

⑥ 同样的记载也见于《孔子家语》卷一：“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魏·王肃注：“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别而葬之，贬之不令近先公也。”

⑦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527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⑧ 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⑨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1990年山西侯马战国、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7期。

⑩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夙马——曲村》（第三册），第997~1092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⑪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火电厂秦人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3年第4期。

⑫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文物》1984年第9期。

⑬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僭墓——战国中山国王之墓》（上册），第104~110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⑭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第6~11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⑮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年第10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4~1985年西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91年第12期。

⑯ 《左传》僖二十五年记：“晋侯朝王，王享礼，命之肴。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关于晋文公所请之隧，有三说。一说此隧为王的墓葬制度，贾逵就这样认为：‘隧，王之葬礼，开地通路曰隧。’（《国语·周语中》韦昭注引）。一说是为此隧为王之远郊外的六隧，韦昭本人就认为：‘隧，六隧也。《周礼》天子远郊之地有六乡，则六军之士，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贡赋。唯天子有隧，诸侯则无也。’（《国语·周语中》韦昭注）此外，还有以隧为周王专用的旗帜的看法。按晋文公所请之隧既不可能是周王专用的旗帜，也不可能是周王才有的六隧，关于者一点，《国语·周语中》周襄王对晋文公请隧的答复已经说得很清楚：‘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改今之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这段话清楚地说明这里的

隧与土地有关，而非旗帜。

⑰ 《续汉书·礼仪志下》：“（皇帝之丧礼）司空择工造穿。太史卜日。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副将作，油緹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梁·刘昭注引《旧仪》。

⑱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第5期。

⑲、⑳ 杨楠：《江南土墩墓遗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

㉑ 需要指出的是，楚文化墓葬都是墓穴很深的宽长方形墓穴，这有点类似周文化系统其他亚文化的墓葬，但楚文化墓葬无论等级多高，都只采用一条墓道，这却与吴越文化大型土墩墓相同。

㉒ 目前发现的最早采用墓上封土的墓葬似乎还是晋地，山西新绛县柳泉村墓地M301、302、303三墓是一主二从的异穴同封的墓葬，其上有横长方形夯土台，该组墓的年代，原调查简报判断为战国早期，恐怕稍早，定为战国中期前段可能更恰当些。参看杨富斗、王金平、田建文：《新绛柳泉墓地调查、发掘报告》，《晋都新田》，第145~18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㉓ 杨富斗、王金平、田建文：《新绛柳泉墓地调查、发掘报告》，《晋都新田》，第145~18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㉔ 战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第1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

㉕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临淄文物考古遥感影像图集》，图版拾三·2、拾柒·6-8、拾玖，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年。

㉖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僭墓——战国中山国王之墓》（上册），第104~110页，图三三，文物出版社，1995年。

㉗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清江营盘里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76年第6期。

㉘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第62~6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张家坡西周墓地》，第16~4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㉚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92年春天马-曲村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文物》1993年第1期，11页，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



古研究所：《夙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1期，第4-28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8期，4-5页；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夙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第4-39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夙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文物》2001年第8期，4-21页。需要说明的是，第五次发掘简报没有对M91号墓的椁外积炭状况进行描述，但在叙述椁顶器物分布状况时这样说，“1件陶鬲出土于墓室西北角略高于椁室的积炭处”，可知椁四周填塞的木炭甚至比郭室还高（《文物》1995年第7期，第11页）。

③③ 朱华：《闻喜上郭村古墓葬试掘》，《晋考古》，第一辑，第95~12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③④ 戴春阳：《虢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5期。

③⑤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第8~10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⑥ 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大型墓葬开始修筑比较高大的封土坟丘和丘上享堂，墓室的深度有变浅的趋势，有的大型墓葬的墓道坡度也变得比较平缓，如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厝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偃墓战国中山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但这些中原列国的大墓的墓道仍然比印山大墓的墓道倾斜度大许多。

③⑦ 从报告展示的印山大墓剖面图（图四）来看，大墓现存椁室的木地面仅略高于墓道。不过，在椁室底下及其周围还铺垫和填塞有厚厚的木炭层，新鲜的木炭疏松透气，这些木炭在填土重压下会收缩，木炭吸收水份后也会软化收缩，当印山大墓刚刚建成时，其椁室底部应当比现在还高一些。

③⑧ 苏州博物馆：《真山东周博物馆》，第11~17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⑨ 杨昌鸣：《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郭湖生主编《东方建筑研究》（下册），第

69页，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③⑩ 汪宁生：《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④①、④②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地区文化局、绍兴文管会：《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④③ 杨富斗、王金平、田建文：《新绛柳泉墓地调查、发掘报告》，《晋都新田》，第148页，149页图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④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郊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9，第141~15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④⑤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镇江市博物馆、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句容及金坛市周代土墩墓》，《考古》2006年第7期。

④⑥、④⑦ 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

④⑧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州市农林东路南越国“人”字顶木椁墓》，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羊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第35~48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④⑨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第4~15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④⑩、④⑪ 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2期。

④⑫ 广西博物馆、田东县博物馆：《广西左右江流域崖洞葬调查研究》，原载《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引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队：《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1950~1990），第642~65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④⑬ 从后来西南地区的大姓土司往往自称是中原豪门望族之后、实际上这些社群往往是本地土著大姓的现象来看，吴、越两国王族自称是周、夏王族后代，不能排出这是出于与中原诸侯国争霸的需要，杜撰自己显赫族源历史的可能。《文物》1984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钰淦）